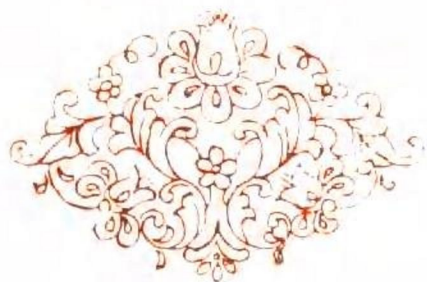


# 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

王荣先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央党校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95  
K263.07

1

2

# 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

王荣先 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C

215428

(京)新登字 10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地革命战争史新论/王荣先主编.-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 1994. 11

ISBN 7-5035-1057-9

I. 土… II. 王… III.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历史-研究  
IV. K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 05147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60 千字 印数: 1—1100 册

定价: 11.00 元

00.0000

责任编辑 蔡雨龙  
封面设计 晓月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吴白桦

---

## 说 明

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受了胜利和失败的锻炼与考验，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转变，取得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认识，开始形成和初步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政治成熟，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研究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着重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不但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会有所启迪。几年来，我们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史，进行专题研究，撰写了几十篇论文，经过修改、合并和筛选，提出 20 篇论文作为初步研究的成果。

这些文章的内容，对于某些事件和人物的分析论断，可能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尊重作者的意见，不强求统一。

由于水平限制，一定会有缺点错误，请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1992年9月30日

## 目 录

-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研究述评……………王荣先 (1)
- 试析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理论 and 实践……………盖 军 (18)
- 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评析……………盖 军 (49)
-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研究述评……………盖 军 (66)
- 试论土地革命的兴起……………王荣先 (86)
- 关于罗章龙分裂活动的几个问题……………于吉楠 (102)
- 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黄少群 (119)
- 王明“左”倾经济政策及其对根据地的危害述论……………唐正芒 (154)
- 东方军论析……………宫 力 (184)
- 试论博古到中央苏区后的“左”倾错误……………齐向葵 (212)
- 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查田运动……………郭 伟 (235)
-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闽浙赣苏区的严重  
危害……………杨维志 (260)
- 有关王明的几个问题……………王荣先 (297)
-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方针的实现……………王荣先 (315)
- 试析三支主力红军的会师……………王荣先 (331)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演变……………王荣先 (343)
-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于吉楠 (356)
- 刘少奇对白区工人运动的贡献……………盖 军 (369)
- 论白区赤色工会……………刘晶芳 (386)
- 党在上海领导的文化斗争……………刘文军 (412)

#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 各地武装起义研究述评

王 荣 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中国革命蒙受重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顽强地战斗，组织、发动工农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对于这段英勇奋战、光辉夺目的历史篇章，党史工作者过去研究较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导下，中共党史学界就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发表了许多研究文章，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资料汇编，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虽然尚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可以继续展开争鸣，这有助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 一

几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党史工作者发表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的论文有100多篇，党史、军史、大事记、回忆录、资料汇编、辞典等涉及这个问题的至少有几十种之多，诸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分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南昌

起义资料》，《广州起义资料》，《朱德年谱》，《彭德怀自述》等。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剑英传》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有：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南昌起义》（资料选编）、《秋收起义》（资料选编）、《广州起义》（资料选编）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周总理生平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二辑（1927年—1933年）、《琼崖纵队史》。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八一南昌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湘南起义史稿》。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简明中共党史辞典》。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有《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等。从发表的论文和有关著述的内容看，学术界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的研究有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拓宽了研究领域。过去的许多著作主要是论述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对于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只是一笔带过，缺少研究。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注意研究本地区的武装起义，发掘整理资料，发表了不少论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于1983年11月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和1987年7月编写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把各地武装起义作为战史的大事，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书中介绍的有：1927年9月中下旬，在湖北洪湖周围地区，中共鄂中特委领导沔阳、监利的农民举行起义；中共鄂西特委领导公安县的农民举行起义；9月下旬，杨善集、王文明、冯平、冯白驹等在广东琼崖领导的武装起义；10月，彭湃



等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10月，杨靖宇在河南确山县刘店领导的武装起义；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曹学楷、王志仁等领导的湖北黄安、麻城武装起义；11月，中共鄂北特委领导的湖北襄阳武装起义；12月，罗纳川、余本健在湖南平江、浏阳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1928年1月，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领导的江西弋阳、横峰地区的武装起义；1月，张世熙等在江西万安领导的武装起义；1月，朱德、陈毅在湖南宜章、郴州等县领导的年关起义；1月至4月，在万安起义影响下，江西峡江、永丰、吉安、于都、赣县、南康、信丰、寻邬等县的部分地区的武装起义；3月，贺龙、周逸群等领导湖南桑植的武装起义；3月至6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朱积垒等在闽西平和、永定、龙岩领导的武装起义；5月，刘志丹、唐澍等在陕西渭南、华县领导的武装起义；5月，中共江苏江北特委在泰兴、如皋、靖江、海门、南通等县领导的武装起义；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湖南平江领导的武装起义；10月，中共闽北崇安县的党组织，领导崇安东北乡、北乡农民举行的武装起义；1929年4月，王维舟在四川万源、宣汉边界地区领导的川东武装起义；5月，中共豫南特委在河南商城南部领导的武装起义；1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安徽六安、霍山领导的武装起义；12月，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此外，还提到中国共产党在安徽阜阳、河北玉田、山东阳谷、浙江永康等地的武装起义。事实说明，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除领导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外，还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安徽、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10多个省的广大地区举行了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内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人民顽强地战斗。

第二，充实了三大起义的研究内容。几年来党史工作者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弄清了一些具体情节，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人们对于三大起义的了

解更加全面、准确。

关于南昌起义。(1)酝酿过程：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准备令叶挺等指挥的部队退出东征，争取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一齐回粤，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进行北伐。李立三、邓中夏等被派到九江组织这一行动，发现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很紧，建议中央在南昌举行起义，然后单独率军回粤。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加以领导。过去有人认为南昌起义是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的建议，都不准确<sup>①</sup>。(2)政权机构的产生：由于继续使用国民党的名称，因而起义前成立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特别委员会，负责提出人事安排和文件宣言的起草。起义胜利的当天，中央委员、各省市、特别区、海外党部代表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主席的任命，宣告革命委员会成立。联席会以后，革命委员会在南昌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任命了各部门负责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军事参谋团以及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前敌总指挥等军事负责人。当时的江西人民通讯社特讯写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起义后成立的政权机构。过去把上述任命往往说成是在联席会议上决定的，与史实不符<sup>②</sup>。(3)南下广东的决策：早在7月中旬，中央就认为蒋介石、汪精卫已经控制长江流域，中共军事力量薄弱，无力与之抗衡，而广东是工农运动的核心，且财政丰裕，交通方便，又不受军阀的包围和帝国主义的封锁，遂于7月25日决定脱离张发奎领导，叶挺、贺龙的部队举行南昌起义，尔后单独打到广东去，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再举北伐。8月1日起义胜利后，前委于当天下午决定了南下广东路线。<sup>③</sup>可见，前委决定南下广东，是执行中央的既定方针。

<sup>①②</sup>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8期。

<sup>③</sup> 张英南：《试析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之原因》，见《江西党史通讯》1985年第9期。

(4)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成立：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成立南方局的指示，决定由张国焘任书记，后“因特立(即张国焘)有问题，同志对他动摇不满意”，书记改由张太雷担任。9月28日，张太雷在汕头召开南方局第一次会议，当时前委中的周恩来、彭湃已是南方局委员，会议又“决定立三及代英加入”，这样，前委成员都参加了南方局，不存在前委散伙的问题<sup>①</sup>。

关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起义的名称：过去有的论著称“秋收起义”，有的称：“湖南秋收起义”，现在一般都认为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较准确，因为这次起义的地点在湘赣边区，参加部队主要是湘赣边界的浏阳、平江、醴陵、永新、铜鼓、修水等县的农军和安源工人、矿警队等，起义的领导者是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由各起义部队负责人组成的前敌委员会，以及以易礼容为书记的由起义地区各县负责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sup>②</sup>(2)打出的旗帜：1927年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时，毛泽东和省党委委员一致主张，秋收起义应直接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中共湖南省委派毛泽东去湘赣边界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起义。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前委会，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次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第一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进一步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sup>③</sup>。(3)中共江西省委与起义的关系：过去知道得很少，现在有文章介绍，当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准备发动时，中共江西省委曾派人去抽调当时由于未赶上南昌起义而滞留在赣西北的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放弃攻打长沙计划，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转移时，中共江西省委提出了向宁冈、莲花一带进军的意见。(4)改变进军方向：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定计划是分三路起义，然后进攻

① 《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8期。

② 邓新如：《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几个问题的探讨》，见《争鸣》，1984年第2期。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1页。

长沙，但9月12日第一团受挫，9月14日第三团受挫，14日晚，毛泽东在浏阳上坪召开第三团干部会，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长沙计划，起义军沿湘赣边界退到萍乡。17日得知第二团在浏阳失败，前委遂决定退往湘南。19日，第一、三团分头前进到文家市会师，前委当晚开会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决定退往萍乡、湘南，至此，改变了向长沙进军的原定起义计划。<sup>①</sup>

关于广州起义。(1)起义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过去认为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决定的，与中共中央没有关系。现在较普遍地认为是中共中央领导的。根据如下：其一，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广东省委扩大城乡暴动，夺取全省政权；其二，张太雷参加中央11月扩大会议后，于26日在广州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并报告中央；其三，12月5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回信，同意发动武装起义<sup>②</sup>。(2)参加起义的成员：过去的党史论著中没有提到黄平是起义的领导者，1987年4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补、修订本，指出黄平在起义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和外交委员，是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32年12月在天津被捕后叛变；还指出，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参加了起义。(3)起义的经验教训，许多论著在肯定广州起义的重大意义后指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革命势力企图首先夺取反革命势力强大的城市，并以此为中心坚持革命斗争，是不可能赢得胜利的，不顾中国国情，按照外国的革命模式指导中国革命，是行不通的<sup>③</sup>。

第三，提出了新的见解。在发掘、整理、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有的论著突破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给人以启迪，为推进党史学科的研究做了有益的工作。

---

① 《江汉论坛》，1984年第8期。

② 上海《社联通讯》(增刊)，1983年8月。

③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关于“赣南三整”的历史地位。1927年10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失败后剩下的部队抵赣南安远县天心圩时，进行了思想整顿，稳定了部队情绪，鼓舞斗志，坚定胜利信心。10月底到信丰县大庾地区，进行组织整顿，把部队编为一个纵队，下辖三个支队；为了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党在基层的工作。11月上旬，第五纵队进至崇义县上堡，在这里进行整顿纪律和军事训练，开始向游击战争的方向转变。有的论著认为，“赣南三整”和“三湾改编”在建军史上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不仅在时间上很接近，并且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即从思想教育入手以改造部队，进行组织整顿和纪律教育，也是相同的。特别是“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相结合，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全面提高，为整党、建军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sup>①</sup>。

关于湘南起义的意义。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从粤北转战到湘南，与中共湘南特委取得联系，决定发动湘南起义。在湘南起义的过程中，湘南各县迅速建立起群众的武装力量。3月下旬，湘粤两省敌人陆续调集7个师，向湘南起义军民反扑。4月初，朱德、陈毅率领起义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中旬，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在江西宁冈县砵市会师，使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空前壮大，湘南起义建立的农军，成为红四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湘南起义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sup>②</sup>。

关于武装起义与“八七”会议的关系。过去有一种比较有影响的想法认为，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发动的，至于其他地区的武装起义，则是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鼓舞下举行的。现在许多党史论著

<sup>①</sup> 刘学民：《试论朱德领导的“赣南三整”》，见《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sup>②</sup> 吴伟良：《论湘南暴动》，见《暨南学报》1984年第1期。

都认为,上述观点不完全符合史实,有相当一部分武装起义与“八七”会议直接有关,根据如下:其一,“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秋收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并把起义的重点放在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省。其二,“八七”会议后,中共鄂北特委曾一度直属中央,王一飞、陆沉、李富春等先后奉中央和省委命令,去鄂北地区领导秋收暴动,1927年9月至11月,在枣阳县发动了多次起义<sup>①</sup>。其三,1927年9月,湖北黄安、麻城两县中共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得知会议发出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后,两县党组织随即制定了贯彻“八七”会议决议的计划,9月下旬开始发动群众,10月,中共湖北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鄂东特委,统一领导黄麻等县的武装起义。11月13日爆发了黄麻起义,中共鄂东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指示,将黄麻两县起义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其四,1927年9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北省委指示,中共鄂中特委领导沔阳、监利的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中共鄂西特委领导公安县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初,周逸群、贺龙把这里的游击队组织起来,坚持洪湖地区的游击战争<sup>②</sup>。其他,还有上海郊区的农民武装起义和江苏的农民武装起义,都是响应“八七”会议关于举行秋收起义的号召举行的。另外,广东海陆丰、海南岛和湖南桑植的起义,则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的。总之,不能认为这些起义是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发动的。

关于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特点。有的同志认为,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领导的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在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实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壮、汉、瑶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亲密无间,共同战斗,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sup>③</sup>。

① 詹华如:《为鄂北秋暴争鸣》,见《湖北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③ 《广西党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

## 二

在研究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党史工作者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完全一致，存在着分歧，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主要问题有：

### 第一，关于各地武装起义的评价问题

许多论著一致认为，各地武装起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围攻，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为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但是，如何全面评价这些起义，则说法不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当时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已经转入低潮，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以城市为中心进行革命斗争已经不可能获得胜利。这时，全党所需要的是组织正确的退却，以便保存革命阵地和聚集革命力量，准备以后组织新的进攻。各地武装起义，只是一种局部性的革命进攻。这种革命进攻，就全局来说，暂时也只是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防御<sup>①</sup>。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各地武装起义虽然有的胜利、有的失败了，但是，在武装起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个伟大的创举。中国共产党以农村为革命基地，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在革命低潮时期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将革命的退却和进攻巧妙地结合起来，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sup>②</sup>。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各地武装起义，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他们说，这些起义，高举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旗帜，在起义中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锻炼

①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29页。

② 《中国革命史通俗讲座》，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3页。

和造就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和群众领袖，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sup>①</sup>。

上述三种意见，虽然各说各的，没有公开争论，但表明确实存在着分歧。

第二，关于南昌起义研究中的分歧意见有：

1. 南昌起义与土地革命的关系。过去有的论著认为，南昌起义领导机关没有充分认识农民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起义后没有把部队开进广大的农村与农民群众相结合，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近年来，有的论著则认为，南昌起义是土地革命的开始，理由是：（1）1927年7月20日，中央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已进入土地革命阶段，把土地革命当作党的中心任务。（2）根据李立三的报告，南昌起义前中央已决定起义后回粤，目的是实行土地革命。（3）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说：“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可见，南昌起义一开始就是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是以军事力量来推动土地革命的实现。（4）为了实行土地革命，在起义过程中，起义军领导人多次研究了土地革命政纲，并且进行了宣传，也开展了一些打土豪的活动。（5）南昌起义开始阶段没有和两湖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但这不能说明它不搞土地革命，而是打算南下广东去实行土地革命，开始时没有经验，出现这样的缺点是难免的<sup>②</sup>。

2. 南昌起义是否犯了城市中心的错误？过去有的论著认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在中心城市南昌举行起义，以后南下广东又准备夺取广州，这些都是照搬俄国城市起义经验的结果，犯了城市中心的错误。近年来，有的论著则认为，不应简单地把南昌起义看作犯了城市中心的错误。理

<sup>①</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sup>②</sup> 金再及等：《再论南昌起义和实行土地革命》，见《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由是：（1）起义前中共中央决定把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调集南昌，在这里采取单独军事行动，公开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然后回粤与东江农民运动结合，实行土地革命，这是以军事力量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2）起义一开始，起义军领导人就明确提出南下广东，执行中共中央的原定计划，到广东的东江去，决不是一个行军路线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补充物资与兵员以取广州，其主要目的是实行土地革命。（3）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等南昌起义领导人提出了把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根据地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要建立和巩固工农政权和工农武装等，这些思想尽管还处在萌芽阶段，但它对于全党探索新的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总之，不能简单的认为南昌起义犯了城市中心的错误<sup>①</sup>。

3. 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是谁？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周恩来与贺龙会见时，代表前委宣布任命贺龙为南昌起义总指挥。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1）南昌起义没有“总指挥”的名义；（2）整个起义的军事统率是由前委、特委、前敌军委和参谋团集体指挥的，指挥中枢是前委；（3）周恩来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参谋团的负责人，所以是实际上的南昌起义总指挥和起义军总指挥；（4）贺龙从名义上到实际上都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不是起义军总指挥，更不是南昌起义总指挥<sup>②</sup>。

4. 南昌起义准备过程中的一些史实分歧较大。（1）庐山会议召开的次数和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只在7月21日开过一次，有的则说在7月19日和22日召开过两次；（2）九江会议召开的次数和时间也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召开过两次，有的认为召开过三次（7月19日、7月20日、7月23日—24日），有的认为召开过四次（7月20日、7月24日、7月25日、7月26日）；（3）周恩来到九江的时间，有的认为是7月24日，有的认为是7月26日。

<sup>①</sup> 《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sup>②</sup> 《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